

文庫博物館專集（十）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增刊 第九十六期 ——  
(一九九六年八月十二日出版)

1.【自由论坛】	中国的未来刻上了文革烙印	《亚洲周刊》
	警惕文革一套借民族主义还魂	余英时
2.【文献资料】	出身论（节选）	遇罗克
	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	
3.【往事如烟】	童年	秋 木
	逃学	顾晓阳
4.【读者来信】	关于联动的全名	赵淮海

**【自由论坛】** [next column](#) or [back to TOC](#)

经历过文革的每一个人，也都经历一个人格重塑的过程；只要看看像邓小平那样的人物文革前后有怎样的不同，就可懂得这场“革命”是怎样进入到人们的“灵魂深处”。要了解今天的中国，要把握明天的中国，文革十年是一把十分关键的钥匙。

匙。

#### ◇ 没有毛的文革就没有邓的改革

没有毛泽东的文革，就没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这是历史的吊诡与讽刺。不妨设想一下，再过几年当中南海内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时，参加者都是当年的文革“小将”，全国各地的党政军主要官员、国有或私营大企业的负责人、大学校长……也都属于文革中成长起来的那一代，中国还会是原先那种样子吗？

说毛泽东发动文革大错特错，今天应该没有多少人会持异议。所有被卷入这场“革命”的人，不是在这一阶段就是在那一阶段成为受打击的目标，结果则是整个国家、整个民族都是文革的受害者。持续不断的“斗争”和“运动”凝聚为一种莫可名状的恐怖气氛，已成为广大民众的集体回忆。

毛泽东能把如此之大的国家弄得天翻地覆，力量来自于他所驾驭的“历史惯性”。在毛泽东视之为“纲”的阶级斗争中，包含了国共内战的延续，与东西方冷战相关联的反帝斗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方向和领导权之争，中共内部路线斗争，北京高层派别之争和权力之争，以及中国社会内部新老阶层之间潜伏的利益之争。通过发动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把长期阶级斗争中积蓄着的“恶”（破坏力量）藉群众活动的形式重新释放出来，成为他手中极为可怕的政治武器。本来就靠“阶级斗争”取得执政地位的中共，早就丧失了阻止毛泽东把中国导向灾难的功能和机制。

实际上，从晚清以降的一百多年中，接连不断的革命和内外战争破坏占去了一大半时间；即使有几次现代化建设的可能，也只是连场狂风暴雨间隙的短暂晴天。毛泽东的可悲，在于他本来有的大好机会在旧中国的废墟上建设新中国，他却嫌过去破坏还不够彻底，稍安定一点就要再折腾一番，差点把中国最后一点家当都赔进去。

物极必反，正因为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社会的破坏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以至每一个具有起码理智和常识的人都感到荒谬，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突然恢复了自我思考的能力，认识到毛泽东并不是万能的神，他不仅可能犯错而且已经犯错。这一思想的觉醒，不少人是从小一九七一年“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就开始的；五年后爆发的“四五”天安门广场事件，更显示一个新的“启蒙运动”已在危机中孕育成熟。

#### ◇ 重新思考抉择自己命运

如果把文革前的那段历史看成是中华民族逐渐丧失自主思考能力的历史，那么，文革十年的集体苦难却使他们重新得到了思考能力。七十年代末为摆脱毛泽东路线残余而展开的“解放思想”运动为改革开放铺路，很大程度是因为一个自发的“解放思想”运动在文革中已成长起来，就如欧洲的“文艺复兴”乃是中世纪黑暗的产物。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势将持续到未来新世纪，也是因为它不再是某个领袖人物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民众，而是人民获得自主思考能力后首次抉择自己的命运。

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把中共的基本路线从阶级斗争转向发展经济，这不仅是政策方向的改变，而且更是整个社会价值观念的根本性转变。按照马列主义革命理论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其一贯的价值观念中找不到个人现实利益的合理地位。为了在全世界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未来目标，个人的一切现实利益都是可以牺牲的。这种价值体系的理想主义色彩固然有很强的吸引力，但在现实世界中却越来越苍白无力。而一旦像斯大林、毛泽东那些掌握不受监督权力的共产党领袖把崇高理想当作自己迫害无辜、镇压异己以至为非作歹的掩饰，他们宣扬的价值观念（如“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等）就变得虚伪可笑。

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和他的支持者又把这套理想主义价值观推向可笑的极端，变成一种现代宗教崇拜和造神运动，反而加快了美丽肥皂泡的破灭。在文革中吃尽苦头的中国人一待噩梦结束，就迫不及待地把自己的脚跟重新站到了现实利益的土地上。而要收拾毛泽东留下的危局，要保住中共的执政地位，中南海的新主政者也不得不把满足人民大众“现世”的物质利益需求，置于理论教条和“革命理想”之上。

“不管白猫黑猫，能捉老鼠就是好猫”，或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都只是对新的社会价值观念的不同包装。为了让大批老干部退位让贤，当局只得以增加物质待遇来作为交换，第一次公开展示新价值观念已为中共“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接受，从此也确认权力与物质利益交换的合法性，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大业真正开始启动。

#### ◇ 从破坏转向建设的巨大动力

百多年来，中国人民终于有了发财致富的机会，可以堂堂正正地把赚钱和过上好日子作为人生的奋斗目标。要解开改革开放十多年以来中国大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之谜，首先就要懂得文革后中国人民如何从破坏转向建设，敢于追求物质生活的改善和珍惜社会的稳定，形成了中国现代化的巨大动力。

常有人问：中国大陆会不会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左”的路线会不会再重新抬头？在探讨这种“假设性”问题前，首先必须弄清文化大革命不是毛泽东一个人能够搞起来的。在当时内外环境和对毛的个人崇拜的气氛中，大多数人都相信毛泽东绝对正确，都受到他的革命理想主义情绪的激荡，真以为自己是跟着“伟大领袖”去创造史无前例的伟业。就连许多被他打倒的人，也由衷相信自己确实犯了错误，这至少在文革初期是十分普遍的现象。但有谁认为，今天的中国人还会回到文革时代的思考方式？

有人看到最近几年中国大陆不少地方供奉起毛泽东的像，或者看到当年“样板戏”又重登舞台，就以为毛泽东的那套将重新当道了。其实，文化大革命的过来人都知道，当年如有人敢说把毛泽东当“灶王爷”供奉或当作驱邪的钟馗（更不必说拿毛泽东来赚钱），最大可能是落个“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罪名，死于非命。当年毛泽东个人迷信的力量并不在于形式，而在于他能激发起巨大的破坏力量；而今天人们把毛泽东视作保家平安、驱邪招财的神祇，乃是“革命浪漫主义”色彩甚浓的毛最不愿见到的下场。邓小平力拒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实属明智，至少可以避免毛泽东被当作偶像嘲弄的下场。

也只有经历了文革的苦难，中国人民才有了一种对极左路线的抵抗力。在中共建党七十多年的历史中，“左”的路线经常占上风，对中共本身以及整个民族和国家都为祸最烈。但只要中共还是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革命政党，只要它的主要功能仍然是“摧毁旧世界”而不是“创造新世界”，就不可能形成有效抵制极左倾向的内部机制和能力。然而，文化大革命的惨痛经历，不仅迫使中共抛弃被毛泽东和“四人帮”推向极端的“阶级斗争”路线，也令中共内外都产生了抵抗极左倾向的持久力量。搞“左”的那一套不得人心，搞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不得人心，已成为中国社会中的常识。

人们吃尽了毛泽东“无法无天”的苦头，十分珍惜刚能过上的安稳日子，自然希望建立起能有效保障自己利益的法制体系和法制社会，再也不允许某个什么人随心所欲就可以废除宪法，剥夺人民的合法权利。文革后的二十年中，中国大陆的法

制建设有了显著的进展，当政者和民众也开始有了法制观念，这也是文革促成的极重要变化。如果到下世纪神州大地终于成为一个法制的国度，文革“十年浩劫”原来正是起点。

#### ◇ 重建文化与道德规范的迫切性

文革的破坏把一切都推向了极端，最后也砸碎了毛泽东头上神的光环，让邓小平有可能藉着十二亿大众的“人欲”开创一番新事业。这是历尽劫波与血泪的历史转折。在一次接一次毁灭人性的斗争中，不管是斗别人的人还是被斗的人（这次斗别人的，下次可能就变成被斗的），都再难保住起码的尊严和道德规范。文革给中华民族留下的可怕“内伤”，也许要过几代人的时间才会慢慢消去隐痛；它留在人们灵魂中的烙印，也许到下个世纪仍然会不时显露痕迹。

今天在中国社会迅速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人们已越来越感受到重建道德及文化规范的迫切性。文革的一代现已成为中国社会的中坚，如果他们不能自觉约束文革大破坏给予的负面影响，不能把扭曲的人性重新矫正，未来的中国也仍可能向世界展现一种畸形的面貌，祸福难定。文革的代价实在太沉重了，正因为如此，文革的教训也应该成为全民族的遗产，刻在中国人永恒的历史记忆中。

□原载《亚洲周刊》一九九六年五月二十六日，输入：周其弘

∞ ∞ ∞ ∞ ∞ ∞ ∞ ∞ ∞ ∞

警惕文革一套借民族主义还魂

• 余英时 •

按照大陆文革中对派别的分类法，我大概算是海外的“逍遥派”吧。整个文革过程中我没有参加过任何一个集会，当时美国的“保卫钓鱼台”运动，集会是很很多的。四十年代我在北平倒是见识过学生运动的，但自己没有参与。台湾的学生那些年一直被国民党压得很厉害，一到海外就发生反弹，要看《人民日报》，读三十年代左翼文学，对大陆的红色中国生出许多幻想，保卫钓鱼台运动和海外文革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产生的。海外也是有文革发生的。一九七二年至七五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教书，中文大学的学生会全部左倾，提的口号比共产党还左。我对文革一直是持批评态度的，当时《明报月刊》上正在连载我的一些讨论学术自由和传统中的“反智论”的文章。这些文章后来都收入在《史学与传统》一书里。香港左派的《新晚报》就发表一篇不点名的批判专稿——“揭开某学者的学术画皮”等等，说我“反对发展中美友谊”、“污蔑干部政策”什么的，有点不知所云。左倾的学生更认定我是站在腐朽、落后的帝国主义反动派的立场。当时大家都不了解国内的具体情况，可是文革的影响力却无远弗届，在海外的反响非常巨大。日本不必说，欧洲尤其是法国，从美国校园一直到非洲小国，都在捧毛泽东，还听说过非洲的什么人在北京和毛泽东握过手，回来后几个月不肯洗手的。七十年代初在美国校园，你要没有去过中国，竟然会形成一种压力。我太太陈淑平当时在威斯理女子学院教中文，每天坐一位同事的车上下班，当时的系主任是台湾来的，一直和陈淑平套近乎。忽然有一天，她的汽车横杠上贴出了标语：“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中文课也要教“批林批孔批水浒”，对我太太立刻变脸，关系当然急转直下。海外许多非理性的东西都在那时候发生。我从未崇拜过古今中外任何一个人，自然更不可能崇拜毛泽东，算是当时的少数派——大概置身事外的“逍遥派”总归是少数派吧？今天纪念文革，我想我们海外的人对国内发生的许多疯狂也许不必太多责备，反而对海外当时的文革狂热，应该进行反省。我记得当时有一位很著名的高能物理学家从大陆回来说：全大陆只剩下一只苍蝇，共产党把苍蝇都打光了，而剩下的最后那一只却偏偏被他看到了。一位女学者回来说，台湾每三个女人就有一个妓女，只有大

陆上的妇女成为革命的半边天。这些说法现在听来象是全都失掉了理性，在当时，说的、听的、信的可都是非常严肃郑重的。我想，除了当时的资讯隔绝造成海外的大陆幻象以外，我们中国人的国民性与人性中的某些方面，特别是近百年来几乎笼罩一切而又夹缠不清的民族主义，是一个非常值得正视的问题。

民族主义是造成文革乱局背后的一个重要力量，是义和团运动的扩大再版。要警惕文革这一大套东西，还有可能要借民族主义还魂。我最近有这样一种预感：中国共产党现在想借民族主义作为政治控制的最后手段，把国家往纳粹式的“国家社会主义”上引，走一条中国式的纳粹主义道路。这样说并不是危言耸听，是有事实根据的。现在中共官方在大陆社会上下煽起一股非常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连知识分子都很受这股情绪传染左右。这样的民族主义是最容易走极端的。

我们今天纪念文革三十周年，其实每个人都有有一个自己的文革，每个人都有有一个自己的文革故事。就象月映万川，一千一万条河流上各各都会有一个不同形态的月亮一样。我想对此不必强求统一。我是学历史的，从历史上看，也许对文革作为一个历史事件可以有种种不同的看法和评价，大体上，我认为有这样两点是可以清晰指出来的：一是，文革这一场浩劫，在中国整个的历史文化中是一个起负面作用的事件。不管在文革影响下产生了多少本来目的以外的结果，这些结果可能有消极的也有积极的作用，作为历史事件，文革的负面性质并不可能因此而改变。二是，不能简单地把 1966—1976 发生的十年文革，看成是一个意外事件。这其实是中共官方最喜欢强调的一种说法。刚才说月映万川，这里则是山从势走。山势一定是从低到高，慢慢走向它的最高峰的。有共产党开始，文革就已经开始酝酿了。我最近看了一本大陆出的记述陈寅恪在四九年以后生活实录的书，1958 年批陈寅恪的时候，广州中山大学用的已经是文革的语言了，相当粗暴专断。对文革起因的追溯要追到很早，比如红区和延安时代，就有内部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比如所谓“污损领袖像”要治重罪的问题，也许还要追到俄国早年，沙俄时代就不准污损沙皇的画像。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到处挂皇帝像的习俗，当然也谈不上污损与否，这样的问题就不能简单归咎到中国传统上去。我并不认为文革的恶梦就此结束了。没有，现在来总结文革，或者还为时太早。从某种意义上说，广义的文革在中国大陆不但没有结束，而且以民族情绪为中心的新式的文革，又在酝酿之中。一个多月以前，吴宏达到普林斯顿大学来演讲“劳改”专题，我便亲眼看见大陆留学生在党组织操纵下，上演相当文革式的“斗争”表演，当时美国的听众都仓皇失措，不知如何是好，最后校警不得不将奉命“斗争”的几个大陆学生赶出会场。后来读新闻报道，才知道几天后吴宏达到另一间学校演讲，又出现了同样模式的“斗争”场面。“一叶知秋”。这是一个新的信号。三十年前的文革是有人组织操纵的，参加者都以为自己自由意志，但其实这个“自由意志”不过是“假意识”。今天正在跃跃欲试的新“文革”也是如此，背后有一批人在组织策划，个别参加的人自以为是为“爱国”行动，历史的真相将来一定会暴露出来。所以说，如果不对产生文革的诸种根源随时保持警惕——比如各种走极端的民族主义，我愿意重复一遍我上面提到的忧虑：中国式的纳粹主义，也许会在未来出现。

（据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文化中国：文革三十年”研讨会发言记录整理  
整理人：苏炜，全文经作者最后订正）

□原载 《民主中国》 总 34 期

~~~~~  
【文献资料】 [next column](#) or [back to TOC](#)

〔编者按〕 《出身论》以“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名义发表于一九六七年初，作者遇罗克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该文第一、二部分标题为：“社会影响和家庭影响问题”、“重在表现问题”，主要是以马列和毛的语录反驳血统论。本

刊在此重刊其第三部分——“受害问题”，这是导致作者被判处死刑的主要“罪证”。

## 出身论

• 遇罗克 •

### ◇三、受害问题

有一位首长在一九六一年讲过，“出身不同的青年之间，不应该存在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不应该存在，可是偏偏存在着，这是怎么造成的？

记得运动初期，受害问题首先由一些时髦人物提出来了。随着，大家都说自己受了修正主义集团的迫害。修正主义集团那么反动，要是自己不但没受迫害，反而受到宠爱，那还算是革命者吗？于是谭立夫也说 he 受害了。经济上受害吗？困难时期他大吃荷兰炼乳；政治上受害吗？思想那么反动还入了党，哪一点象受过委屈的公子哥儿？新改组的《北京日报》也大登特登红五类出身的青年诉苦文章，说他们是前市委修正主义路线的受害者。应该说，所有的青年都是受害者，为什么单是出身好的青年是受害者呢？我们看一看他们受了哪些害。

(一)“我们被拒于大学之外，大学为剥削阶级子女大开方便之门”；(二)“大学里出身好的青年功课不好，大受教授白眼”；(三)“有的出身不好的青年竟被提升当干部”；(四)“……”。假使这就算是受害，那么，受害的正是出身不好的青年，堂堂首都一份大报竟然这么颠倒黑白，那也无怪乎它寿终正寝了，还是让事实说话吧！

回想修正主义集团当政时，每年大学招生完毕，前高教部总发表公告：“本年优先录取了大批工农子弟，革干子弟。”不少大学几乎完全不招收黑五类子女。大学中的重要科系就更不用提了。学校则以设立“工农革干班”为荣。难道这就是“为剥削阶级子女大开方便之门”了吗？上了大学的，也是出身好的人受优待。不少大学成立“贫协”一类的组织，与团组织并存。这次运动开展以来，有禁止黑七类子女串联的，有用出身攻击敢于写大字报的同学的，有不许出身不好的青年参加各种战斗组织的，有借出身挑动群众斗群众的……。这些大家都不感到怎样意外，可见出身不好的青年受迫害历来就是常事。至于说红五类出身的青年学不好功课，那纯粹是对出身好的青年的诬蔑。何以见得出身和学习一定成反比呢？中学也如是，据前北京市教育局的调查乱班材料，其中有“捣乱”学生出身调查一项（注意，这里的“捣乱”和造反没有关系，材料中指的是大谈男女关系，有偷窃行为的），大多出身很好，有在乱班中别人都闹他不闹的，出身反而挺糟，问其原因，答曰：“我出身不好，人家闹没事，我一闹就有事了。”这话不假，不用说中学，连小学也是如此。有位校长对青年教师说：“有两个孩子同时说一句反动的话，出身好的是影响问题，出身不好的是本质问题。”不知道是不是前团市委的指示，一度某些学校所有出身不好的少先队干部全改选了。近几年中学的团干部、班干部也都是从出身这个角度考虑的。一般教师也许是为舆论左右，也许是发自肺腑，没有不对出身好的青年（特别是革干子弟）另眼看待的，相反的情况纯然是例外。否则，早就扣你个“没有阶级观点”的大帽子了。

工厂这种现象也很普遍。凡是近三、四年提升的行政干部，几乎无一例外是出身好的。就连先进工作者候选名单上也有出身这一栏。有的工厂还规定，出身不好的师傅不许带徒工，不许操作精密机床。运动初期还有规定“出身不好的工人有选

举权但没有被选举权”的。在总结各厂当权派罪状的时候，所谓招降纳叛（即曾经提拔过某个出身不好的人做了技术干部），是十分要紧的一条。可想而知，以后的当权派要再敢这么办才怪呢。工厂里也组织了红卫兵。出身限制很严。翻遍中央文件，只有依靠工人一说，从未见依靠出身好的工人一说。是谁把工人分成两派了呢？

农村中这样的例子更多。修正主义代表人物搞过“四清”的地方，把地富子女划分了一下成份，表现不好的，出身就是成份；表现一般的，是农业劳动者；表现好的，是中农。为什么表现好的就是中农呢？不能算贫下中农吗？那么贫下中农子弟表现坏的是不是也要划成地主富农呢？表现是出身的结果呢？还是出身是表现的结果呢？出身不好，便不能做行政、财会、保管等工作，也不能外调。没有普及中学教育的农村，能够上初中的，要教师、贫协、大队长三结合推荐。当然，他们谁肯为出身不好的少年背黑锅呢？大队长介绍：“这个娃出身好，又听话，肯干活，就是他吧！”这样的，就上初中。

社会上其他部分也如是。北京的街道近两年改选居民委员会，出身是一个首要条件。连街道办事处印制的无职业青年求业登记表上也有出身这一项。求业表上主要就有两项，除去出身，还有一项是本人简历。自己填写简历，又都是青年，自然情况差不多。用工作单位来挑人，没有不挑出身好的。要不，放着出身好的你不挑，单挑出身坏的，是什么思想？所以，不被学校录取而在街道求职的青年，积年沉淀下来的，大多是出身不好的。只有在大批分配工作的时候，他们才会有被分配的把握。

“出身压死人”这句话一点也不假！类似的例子，只要是个克服了“阶级偏见”的人，都能比我们举的更多、更典型。那么，谁是受害者呢？象这样发展下去，与美国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罗、日本的贱民等种姓制度还有什么区别呢？

“这正是对他们的考验呀！”收起你的考验吧！你把人家估计得和他们的家长差不多，想复辟、不保险、太落后，反过来又这样过高地要求人家，以为他能经受得住这样超人的考验。看其估计，审其要求，是何等矛盾！忘记了马克思的话吗？“要求不幸者是完美无缺的”，那够多么不道德！

“他们的爸爸压迫过我们的爸爸，所以我们现在对他们不客气！”何等狭隘的血统观念！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父亲破了产，儿子只要宣布放弃继承权，就可以脱离关系，想不到今天父子关系竟紧密到这个地步了，“左”得多么可爱啊！

算了！我们不再浪费笔墨于这种毫无见地的谬论了。让我们研究一下产生这种新的种姓制度的根源吧！

这正是修正主义分子一手造成的。那么资产阶级分子为什么要压迫资产阶级出身的子弟呢？这不奇怪吗？我们说这一点也不奇怪。正因为这些青年和他们不属于同一阶级，所以他们才这样做。而对于实现复辟阴谋，无论是无产阶级出身的子弟，还是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子弟，在他们看来是没有区别的。或许，那些温室里的花朵，那些不谙世面而又躺在“自来红”包袱上的青年对他们更有利一些。特别是一九六二年，毛主席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以后，这些阴谋家便慌了手脚。当前的阶级斗争，矛头指向谁呢？斗争的矛头主要是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他们所包庇的牛鬼蛇神。为了转移斗争的方向，他们便偷换了概念。本来父亲的成份应该是儿子的出身，现在，他们却把父亲的成份当成了儿子的成份。这样就在“阶级斗争”的幌子下，不顾中央指示，一场大规模的迫害，通过有形无形的手段，便紧锣密鼓地开场了。出身不好的青年是他们的挡箭牌，而压迫这些天生的“罪人”，则成了他们挂羊头、卖狗肉，扰乱视听的金字招牌。



党中央正确地指出了他们推行形“左”实右路线，这便是其中一个渊源。

他们干这种罪恶勾当，利用的是社会上的旧习惯势力，利用的是青少年的天真幼稚，特别利用一些高干子女的盲目自豪感（例如把自己划在一二三类，因为革军、革烈实际也就是革干，而工农子女便只好是第四、第五两类了）。他们还利用部分中下层干部的缺点和错误。有些干部所以承认并且推行了这一套反动的政策，在理论上是无知的表现，他们分不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什么是小资产阶级的唯出身论；在认识上是暧昧的表现，他们分辨不出青年的哪些表现是本质的，哪些表现是表面的；在工作上是软弱无力的表现，他们不会给青年人提供表现政治思想的机会，他们不会做政治工作，以致把出身当工具，打击一些人，鼓励一些人，以推进工作；在政治上是热情衰退的表现，他们不愿做细致的调查研究，满足于用出身当框框；在革命意志上是怕字当头的表现，他们不敢提拔真正表现好的人，怕负责任。于是这些东西一起推波助澜，形成了在我们的社会制度下，在我们党的身边所绝对不能容忍的现象。一个新的特权阶层形成了，一个新的受歧视的阶层也随之形成了，而这又都是先天的，是无法更改的。正如毛主席指出的，种族压迫，就是阶级压迫。反动的修正主义分子的这套做法，也正是资产阶级反革命复辟的前奏。我们不能不指出，即使如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主要还是从右边抹杀了阶级路线，因为他们肆意包庇地富反坏右分子，包庇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把资产阶级权威老爷拉入党内，给某些五类分子厚禄高薪，和他们大讲和平共处。反过来却迫害出身不好的青年，迫害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接班人，这不是一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又是什么？

工作队当政时期，又以极“左”的面目抹杀了阶级路线。在对待出身问题上，与修正主义集团可以称得上是一丘之貉。因此，这个严重的社会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更加深化了，反而将矛盾扩大化、公开化了。残酷的“连根拔”，极尽侮辱之能事的所谓“辩论”，以及搜身、辱骂、拘留以及殴打等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破坏这一部分青年生活的正常秩序的种种手段，剥夺他们政治权利的种种措施，全都以“超毛泽东思想”的面目出现了。迫使这么多人消沉了，感到自己是无罪的罪人，低人一头，很见不得人。他们不能以全部力量投入运动。想革命而又没有革命的本钱，想造反而又没有造反的条件，室杀了多少革命青年的热情！革命队伍缩小了，这正中反动路线的下怀。客观上起到了包庇钻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作用，起到了挑动群众斗群众的作用。有理由这样讲：如果不把以前受压迫最深的这一大部分革命青年彻底解放出来，那么这次运动就决不会取得彻底胜利！

同志们，难道还能允许这种现象继续存在下去吗？不应当填平这人为的鸿沟吗？在反动势力当政时期，受压抑的青年不仅是出身不好的青年，也包括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抗的工农出身的青年及其他革命青年。我们呼吁：一切受反动势力迫害的革命青年，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你们受资产阶级压迫最深，反抗应该最坚决。在批判他们的时候，你们最有发言权。那些冒牌受害实际上得宠的谭式人物没有发言权。依靠他们批判，必然不深不透。所以你们决不是局外人，你们是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人。只有胆小鬼才等待别人恩赐，而革命者从来依靠的就是斗争！你们应该责无旁贷地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党的阶级路线。既不容许修正主义集团从右面歪曲它，也不容许反动路线从“左”面攻击它。你们应该相信自己能够胜任这一光荣任务！你们也不应该排斥那些没有受压抑也没有偏见的青年。你们可以团结他们，共同战斗，共同提高。同志们，我们要相信党，我们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胜利必将属于你们！

一切受压迫的革命青年，起来勇敢战斗吧！

1966年7月初稿，9月定稿，11月修改。



□转载自《中学文革报》创刊号，1967年1月18日 赵淮海推荐并提供资料

∞ ∞ ∞ ∞ ∞ ∞ ∞ ∞ ∞ ∞ ∞  
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  
（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通过）

◇ 一、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

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

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作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资产阶级虽然已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 二、主流和曲折

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有魄力、有智慧。他们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了进攻。在这样大的革命运动中，他们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沿着这个大方向继续前进。

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会有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来自旧的社会习惯势力。这种阻力目前还是相当大的，顽强的。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毕竟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大量事实说明，只要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这种阻力就会迅速被冲垮。

由于阻力比较大，斗争会有反复，甚至可能有多次反复。这种反复，没有什么害处。它将使无产阶级和其它劳动群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得到锻炼，取得经验教训，懂得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

◇ 三、“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

党的领导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将决定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命运。目前党的各级组织，对文化革命运动的领导，存在着四种情况。

（一）能够站在运动的最前面，敢于放手发动群众。他们是“敢”字当头、无所畏惧的共产主义战士，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他们提倡大字报、大辩论，鼓励群众揭露一切牛鬼蛇神，同时也鼓励群众批评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种正确领导就是由于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由于毛泽东思想领先。

（二）有许多单位的负责人，对于这场伟大的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因而处于软弱无能的地位。他们是“怕”字当头，墨守旧的章法，不愿意打破常规，不求进取。对于群众的革命新秩序，他们感到突然，以致领导落后于形势，落后于群众。

（三）有些单位的负责人，平时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他们更是“怕”字当头，怕群众起来抓住他们的辫子。实际上，他们只要认真进行自我批评，接受群众批评，是会被党和群众谅解的。不这样做，就会继续犯错误，以致成为群众运动的绊脚石。

（四）有些单位是被一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着。这些当权派极端害怕群众揭露他们，因而找各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他们采用转移目标、颠倒黑白的手段，企图把运动引向邪路。当他们感到非常孤立，真混不下去的时候，还进一步耍阴谋，放暗箭，造谣言，极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打击革命派。

党中央对各级党委的要求，就是要坚持正确的领导，“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改变那种处于软弱无能的状态，鼓励那些有错误而愿意改正的同志放下包袱，参加战斗，撤换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

#### ◇ 四、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

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那些是对的，那些是错的，那些作法是正确的，那些作法是不正确的。

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以便群众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的意见，揭露一切牛鬼蛇神。这样，才能使广大群众在斗争中提高觉悟，增长才干，辨别是非，分清敌我。

#### ◇ 五、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当领导的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这样，才能够在运动中，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经过运动，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

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充分地揭露和批判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把他们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注意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同拥护党和社会主义，但也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或写过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注意把资产阶级的反动学阀、反动“权威”，同具有一般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 ◇ 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必须严格分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不要把人民内部矛盾搞成敌我矛盾，也不要把敌我矛盾搞成人民内部矛盾。

人民群众中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现象。几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是必要的，是有益的。群众会在正常的充分的辩论中，肯定正确，改正错误，逐步取得一致。

在辩论中，必须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对于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也不准采取任何压服的办法。要保护少数，因为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即使少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也允许他们申辩，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

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在辩论中，每个革命者都要善于独立思考，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革命的同志，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不要在枝节问题上争论不休，以便加强团结。

#### ◇ 七、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

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对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他们这样做，必然要打击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积极分子。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决不允许这样做。

有些有严重错误思想的人们，甚至有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利用群众运动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散布流言蜚语，进行煽动，故意把一些群众打成“反革命”。要谨防扒手，及时揭穿他们耍弄的这套把戏。

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

#### ◇ 八、干部问题

干部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种：

- （一）好的。
- （二）比较好的。
- （三）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 （四）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在一般情况下，前两种人（好的，比较好的）是大多数。

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要斗倒，斗垮，斗臭，肃清他们的影响，同时给以出路，让他们重新做人。

#### ◇ 九、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开始涌现了许多新事物。在许多学校、许多单位，群众所创造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等组织形式，就是一种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事物。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组织形式。它是我们党同群众密切联系的最好的桥梁。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

无产阶级同过去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斗争需要经历很长很长的时期。因此，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不应当是临时性的组织，而应当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它不但适用于学校、机关，也基本上适用于工矿企业、街道、农村。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在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

当选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

在学校中，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应该以革命学生为主体，同时，要有一定数量的革命教师职工的代表参加。

#### ◇ 十、教学改革

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育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

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

在各类学校中，必须彻底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学制要缩短。课程设置要精简。教材要彻底改革，有的首先删繁就简。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也就是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的斗争。

#### ◇ 十一、报刊上点名批判的问题

在进行文化革命群众运动的时候，必须把对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传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传播，同对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思想批判很好地结合起来。

要组织对那些有代表性的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判，其中包括对哲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教育学、文艺作品、文艺理论、自然科学理论等战线上的各种反动观点的批判。

在报刊上点名批判，应当经过同级党委讨论，有的要报上级党委批准。

#### ◇ 十二、关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的政策

对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只要他们是爱国的，是积极工作的，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不里通外国的，在这次运动中，都应该继续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应该加以保护。对他们的世界观和作风，可以帮助他们逐步改造。

#### ◇ 十三、同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相结合的部署问题

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领导机关，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点。

文革使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更加丰富、更加提高了。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各地区、各部门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部署。

在农村和城市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地方，如果原来的部署是合适的，又做得好，就不要打乱它，继续按照原来的部署进行。但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提出的问题，应当在适当的时机，交给群众讨论，以便进一步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思想。

有的地方，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中心，带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这样做，如果那里党委认为合适，也是可以的。

#### ◇ 十四、抓革命，促生产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只要充分发动群众，妥善安排，就能够保证文化革命和生产两不误，保证各项工作的高质量。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把文化大革命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 ◇ 十五、部队

部队的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

#### ◇ 十六、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在广大工农兵、广大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中，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运动，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

各级党委，在这样错综复杂的文化大革命中，更必须认真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是要反复学习毛主席有关文化革命和党的领导方法的著作，例如，《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各级党委，要遵守毛主席历来的指示，贯彻执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先做学生，后做先生。要努力避免片面性和局限性。要提倡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和烦琐哲学。

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取得伟大的胜利。

□ 原载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人民日报》，转载自《四大广场》

~~~~~

【往事如烟】 [next column](#) or [back to TOC](#)

童年

• 秋木 •

去年回国，和姐姐一家人聊天。话题很自然就转到了姐姐九岁的小女儿阿原的身上。姐姐告诉我阿原去年有十多条裙子一次都没穿过。我环视着房间，长沙发的旁边是一架新钢琴，钢琴上面是一幅阿原的大彩照。而在房间的另一角落我的小外甥女正对着大电视自己在唱卡拉OK。一边唱还一边跳，毫无怯色，无忧无虑。

凝视着姐姐的小女儿，我的视线逐渐模糊了，眼前出现了姐姐十岁时的形象。

那是一个血雨腥风的年代。当时妈妈以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的双料罪名在单位开始被批斗。群专规定妈妈要在大家上班之前就挂着牌子站在大门口，然后劳动一天，快要下班时又要挂牌子站在大门口，直到人们下班走光了，她还要挂着牌子回家。为了不让邻居们知道妈妈挨斗，为了让妈妈也象其它人的父母一样只提一个小包上下班，年仅十岁的姐姐每天早上5点就起床，把比她半个身子还高的大牌子用布包好，提到妈妈单位附近。妈妈随后跟到那里，挂上牌子，走到单位门前。妈妈下班之前，姐姐又早就等在那里，把牌子再包起来，拎回家来。

不久居民组也开始斗争妈妈了。记得那天晚上楼道里是昏暗的灯光，楼梯上下坐满了人。妈妈挂着牌子站在前面，那些平时毫无表情的邻居们都变得面目狰狞，批斗声，口号声，辱骂声混杂在一起。爸爸在房间里急得走来走去，不时地把耳朵贴在门缝上。群专不许他参加批斗会。我们跑来跑去给爸爸传递消息。我看到那些平时呆在家里养足了精神的家庭妇女，手指着妈妈大骂。小孩子们纷纷向妈妈身上、脸上吐痰。妈妈开始还想躲避，后来前后左右无法躲避。那时妈妈也只有三十多岁。

随后妈妈又被单位造反派关押起来。哥哥，姐姐和我轮班拎着大饭盒每天给妈妈送饭。每次送饭回来爸爸都详细地问我们发现妈妈有什么变化没有。一次我告诉爸爸说妈妈眼睛好象青了一块。爸爸当时十分悲痛，自言自语地反复叨咕“他们打她了，他们打她了…”。后来妈妈讲，一群造反派把她围在中间从这边打到那边，又从那边打到这边。面对这种人身、人格的污辱，她几次想到死。她多少次站在关押她的楼上，想纵身跳下去。而每当此时她都会想到我们哥仨会变成无娘的孤儿，这又给她生存的力量，去承受那些常人已经无法承受的折磨。

后来爸爸也被关押起来。爸爸曾是一个热血青年，当年曾在国民党政府里任要职。因对国民党不满，毅然与国民党决裂，站到民主人士一边，还险些被国民党特务给投到黄浦江里。解放后，他怀着建设新中国的热情，坚决要求到北方支援建设

。虽然他对北方的气候和食物不适应，但他还是把全部精力都用到工作上去。一九五七年鸣放时，爸爸非常高兴，回家对妈妈说，“共产党真伟大，毛主席真英明，中国太有希望了。”然后告诉妈妈带孩子到外面去玩，不要吵他，他要给党提意见。爸爸以赤诚之心，花费了几个不眠之夜，向组织上提交了一个书面报告，衷心希望组织上能改正缺点，更好地带领人民建设我们的国家。孰料这是毛泽东的一场阴谋运动。爸爸立即被打成右派，大会小会地被批斗，没日没夜地写检讨，还要自己给自己无限地上纲上线。后来又被送到农场去劳改。与爸爸一起被关在农场的还有记者、出版社编辑及大学教授等。在农场，他们每天要做十多个小时的超体力劳动，即使发霉的粗粮也不够吃。后来听爸爸说，他每餐的第一碗饭从来是来不及嚼的，吞下去再抢第二碗。每天劳动回来还要做思想汇报。有实在干不动稍微休息一下的，晚上回来一定是要挨打的。最残酷的是他们要求右派们相互监督，打小报告并相互殴打。文革开始后，爸爸又首当其冲，被关押，批斗。后来爸爸的一位老同事三结合时做为老干部进了领导班子。他强调爸爸需要劳动改造，送爸爸去家属楼烧锅炉。这实际是要爸爸避开外面的急风暴雨式的批斗和折磨。然而烧锅炉并不轻松，每天早上要将许多煤挑到地下室，晚上又要将清理出的废炭从地下室挑到外面去。爸爸已被右派农场摧残得只剩下皮包骨，未老却先衰，花白的头发，弯弯的后背，浑身都是病。十二岁的哥哥就每天早上跑很远的路来帮爸爸挑煤，放学后又去帮爸爸把煤渣挑到外面去。爸爸后来说看到哥哥弱小的身体，挑着担子，晃晃荡荡地走在地下室的窄小的楼梯上，心里比刀割都难受。在我童年的记忆里，爸爸一年大部分时间都穿一件破棉衣。那件棉衣已看不出本来的布料和颜色了，上面缝满了补丁，也挂满了油污。这就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在中国所受到的待遇。

在那些白色恐怖的日子里，我们这些小孩也不能幸免。我最好的小伙伴的爸爸是历史反革命，不久全家被赶到了农村。临行前没人敢为他们送行。我乘人不注意时塞给他一个毛泽东像章作为留念后就赶紧跑开。我们家的境况更糟。我的外公是历史反革命，镇反时险些被枪杀；艰苦奋斗，克勤克俭一生的爷爷成了大地主；爸爸和一个舅舅均是大右派，妈妈又是特务。我们走在路上就会有小孩围过来骂我们是“大地主”，“反革命”，“国民党特务”。最可怜的是哥哥，他自己挨骂可以忍受，但对弟弟妹妹的欺辱是他决不能忍受的。每次哥哥都会挺身而出试图来保护我们，结果他也总是被那些大孩子们打得头破血流。

幼年的我受到的第一次打击是班级选三好学生。品学兼优的我一直是自尊心很强和上进心很强的。开选之前，老师先讲一通要选根红苗壮的孩子。我知道我不会当选，唯一希望不要有人提我做候选人，让我难堪。但还是有不明真相的同学提我做候选人。我强忍着内心的紧张听着宣读票数，结果我以最低的票数落选。当我回到家见到妈妈时，所有的委屈一股脑地爆发出来，拼命地大哭。问明原委之后，妈妈只说了句“你票数不够”就不说话了。隔了半天才又说了句“你同爸爸妈妈划清界线吧”。听了这话我哭得更厉害了。当时我连“票数”是什么意思都搞不太懂，但我知道我不能没有爸爸妈妈。唯有在爸爸妈妈身边我才感觉到人间的温暖，我才是个孩子。在外面，我是一个大人，一个不能乱说乱动的大人。那时最怕的是学校让填表，因为总是要填家庭出身，政治状况，最后还总有一栏是“需要向组织交代的问题”。

当时我穿的衣服也都是哥哥姐姐穿小的，所以也经常有大人问我究竟是男孩还是女孩。姐姐唯一的玩具是一个玩了好多年的小布娃娃，上面已经是补丁摞补丁。我的玩具箱里装的都是些破锁头，小木块之类的东西。那时无事不敢出去玩，怕挨打挨骂，就是这些破锁头，小木块之类的东西伴我度过了多少童年岁月。

我们的遭遇在当时的中国是极其普通的，现在回想起来，真象是一场恶梦。但也正是那个年代使我们的与父母贴得更紧了。当我长大后，唯一发的誓愿就是一定不许任何人再欺负我的爸爸妈妈。现在每星期都会给爸爸妈妈打一个电话。如有



急事晚几天打电话，那么这几天就会心神不宁。打电话时总要和父母都讲上几句话才会放心。

去年回国时，看到国内许多人都崇拜毛泽东，许多人还留恋毛泽东时代。他们可能或者是忘记了过去，或者是对过去不了解。忘记过去并不一定意味着背叛，但不了解历史，不记取历史的教训，历史就有可能重演。我们有责任把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那一段记录下来，让我们的子子孙孙不要再经历我们所经历过的，承受我们所承受的，让他们永远拥有一个真正的童年。

□ 寄自美国 一九九六年五月于底特律

∞ ∞ ∞ ∞ ∞ ∞ ∞ ∞ ∞ ∞

逃 学  
• 顾晓阳 •

大约在一九六八年前后，学校里办了一个“流氓学习班”，班主任便毫不犹豫地把我送了进去。当时我十二岁，念小学五年级。

“学习班”一共有二十几个人，都是全校最知名的坏学生，有打架不要命的，有破坏公物狂（打灯泡、拆课桌椅、毁坏门窗），也有小偷小摸。最多的是扰乱课堂秩序的“害群之马”。我的罪名却是：“抽烟、喝酒、唱黄色歌曲，和不三不四的人来往”。

我第一次抽烟，是从我父亲那儿偷来的“大中华”，我和朋友躲在门洞里，象干什么秘密勾当。他教我怎样把烟吸到肺里去。那天我连抽了两根，脑袋开始发晕，回家后觉得有点恶心，就拿了一个苹果躺在床上吃，刚咬了两小口，便昏昏然睡过去了。后来我们到有梳妆台的人家里去抽，对着镜子，练习鼻孔吸入的技巧。

我父亲抽烟很凶，看书的时候一支接一支。我坐在他不易察觉的位置上，仔细观摩。他一口能吸掉整支烟的四分之一，吸过以后，许久许久才有一点点薄薄的青烟从嘴里或鼻孔漏出来，其余的皆不知去向。

开始我和朋友们都认为这是一种技巧，我们反复练习过，没有成功。

不管把烟在肚子里憋多久，到喷出来时，仍是浓而色白，且与吸入的烟量大致相等。于是大家对我父亲这种老烟鬼称羨不已。

事实上，我们抽烟时非常注意隐蔽。一般都是在大力家抽，一边抽一边放唱片。大力家刚被抄过一次，房间里空空荡荡，唯独这架老俄国留声机幸存下来。有一天正放着《梁祝》，谢鸡子儿慌慌张张地跑进来喊：“快！警察来了！”余音未散，警察已进了门。他十分内行地问我们：“听什么哪？《梁祝》？”然后直奔留声机，拿了唱片就走。事后哥儿几个都是一身冷汗。谢鸡子儿说：“操，一耳朵就听出来是梁祝——丫准是个老‘晃儿’。”

我喝酒的历史比抽烟更长一些。有一阵子我们时兴卖破烂儿，我卖的是一九六四年至一九六六年的《人民日报》，几乎一天不漏。大力的二哥抱出来比城砖还巨大的两本《资本论》，反倒不值几个钱。其他人从家里搜到的是什么，我已记不得了。我们去的是贡院的废品收购站，卖了钱，直奔东单食堂。大家围圆了坐一桌，每人要了一大碗散啤酒，颇有点水泊梁山聚义的架式——“喝罢，将碎银子丢在桌上，唤店小二自来取去。”

我的班主任姓甄，外号叫“老牛”，小脑袋，浑身肌肉，眼睛只是两条缝儿，嘴巴闭不住。他是刚从中学毕业分来的高三学生。在我印象里，那时所有的中学都正在准备上山下乡，他为什么能留在北京当小学老师，不得而知。“老牛”从一开始就看我不顺眼。现在回忆起来，根本想不出他教过我们什么课，是怎么教的；只记得他在课堂里命令我站起来，批评我，一次又一次地逼我写检查，或者在游行（庆祝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原子弹爆炸成功、抗议苏联侵占珍宝岛等等等等）时趁天黑人乱踹我的屁股。如今我能写一点文章，大概跟甄老师当年苦心栽培我写检讨不无关系。记得有一天中午放学后，他不让我回家，非逼我写完一篇深刻检查不可，然后自己就去食堂吃饭了。教室里空无一人，我写了两行就趴在课桌上睡去。后来一位老师偶然进来看到我，问我为什么还不回家？大概我的回答相当凄惨，那老师想了一会，说：“算了，别写了，回家吃饭吧！”

那些年北京市公安局经常在工人体育馆组织“万人公审大会”。说是“审”，实际上判决书早就写好了。先由首长讲话：当前国内外形势一片大好，但是阶级敌人如何如何，然后就宣读判决。每次必有一批死刑犯伏法。犯人皆五花大绑，脚上带镣，脖子上挂着牌子。三个警察，两个在左右，一人在背后揪著犯人衣领。当念到“X X X罪大恶极，民愤极大，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时，后面的警察一脚便将犯人摁倒在地，会场上群众的口号声顿起：“打倒X X X！”“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场面热烈，而且极富戏剧性。死刑犯里五花八门，什么人都有：有现行反革命、逃亡地主、强奸犯、杀人犯……我至今还记得一位死囚的名字，叫夏杜克。他比我大不了几岁（年未及十八岁），父亲是个部级干部，家里生活优裕。但这小子却溜门撬锁，偷盗成性，就为这，给拉出去毙了。

我对班主任“老牛”最不理解的就在这儿：在“流氓学习班”期间，凡有“公审大会”枪毙人，他必命我去参加。问他去干什么？他说让我去“受教育”。人家那儿枪毙人，关我什么事呵？我在那儿能受什么教育呵？就凭我十二岁唱了句“黄歌儿”（“你含苞欲放的花，一旦盛开多美丽”），离犯死罪可还远得很哪！是不是觉得我“罪”不“大”，“恶”不“极”，让我去跟人家多学几手（受教育），好早日将我绑赴刑场呵？

后来有一次，应该上午九点在“工体”北门集合，当天正好下起暴雨，我心一横，骑着自行车奔广渠门外买新鲜蔬菜去了。那是我第一次逃学。

不久后的一天，我和几个初中生去东单体育场打篮球，傍晚饿了，就走到台基厂现在的松鹤楼的前身——一家上海小吃店吃饭。不知为什么，“店小二”看我们的眼神儿当时就不对，等我们点过菜，他又来问我们喝不喝酒？我们就叫了几瓶“小香槟”。吃喝完毕，我手里还攥著半个包子，大伙儿就往外走。一出门全傻了：门外居然已埋伏了一帮警察，象夹道欢迎似的，分两排站着，把我们堵在中间。当时北京市公安局就在这家小吃店斜对面的正义路上，警察出动当然很便捷，但至今我也搞不懂他们为什么要出动抓我们？就算我们是自己找上门来“太岁头上动土”，可吃个便饭能算什么大罪过，犯得着惊动这么多民警叔叔吗？我已经忘了他们是怎样把我们关起来，审了些什么，只记得审讯完毕，隔了很长时间，才又有人进来。来说已经和我们每个人的学校联系过了，让我们明天各自找学校工宣队交代问题。然后他又特别走到我跟前，点着我的鼻子说：“别瞧你最小，你在这里头最坏，我已经全部掌握你的情况了，明天张队长和甄老师找你算帐。”

我们一路往回走，都不说话。我手里剩的半个包子一口也吃不下去。路过东单公园时，顺手扔到树丛里了。我想起“老牛”那身结结实的肌肉，想起他那缝隙似的眼睛，我与这两道缝隙对视了两年，却始终看不到里面藏着什么东西，猜就更猜不到了。我想，我受“万人公审大会”的教育实在已经受够了。所有该当死罪的

行为：书写反动日记、强奸、鸡奸、通奸、诱奸、猥亵……我也都了然于胸，只差身体力行了。所以，我已完全没有必要去学校了……

在我正式逃学的初期，班主任“老牛”仍一心想挽救我。他让许多同学捎话来，希望我“悬崖勒马”。下班后，他常常有意骑车绕道我家门前过，企图把我抓个正着。那时我家附近正在建地铁，工地上堆着用不完的卵石。我在街角、树后和门洞里储备了不少石头。只要“老牛”从胡同经过，我就一阵乱石砸将过去。“老牛”在最后一次终于镇定下来，他捏住手闸停下车，一条腿跨在车梁上，冲我大喊：“姓顾的，你等着！毕业的时候找你算账！”架不住石头不长眼，他喊过后，即蹬车鼠窜而去。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

在逃学的日子里，我度过了少年时代许多快乐的时光。我讨厌学校，也看不起老师。后来我虽然又上过学，但逃学已成了经常性的习惯。我所有有用的知识都是在逃学期间自学、或从朋友们身上学到的。学校还常常使我联想到“万人公审大会”，至少在当时，学校和“万人公审大会”的确具有某种相同的气氛。我虽然逃了学，却无法从那种气氛中彻底挣脱出来，至今依然如此。

□ 原载《新闻自由导报》2006期

~~~~~  
【读者来信】 or go to [the end of this last column](#) or [back to TOC](#)

《华夏文摘》：

近读贵增刊 zk9607b.gb 有大作《红卫兵领袖抚今思昔》一文将“联动”的全称误作“北京市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联系到前此《枫华园》上刊载王兆军的演义——《谁杀了林彪》中将“联动”的全称误作“全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有必要在这里更正一下。“联动”的全称是“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

——赵淮海

Now go to [the previous Zeng Kan issue](#)  
or go back to [the TOC of this issue](#)  
or go to [the next Zeng Kan issue](#)  
or go to [the index of all available issues](#)  
or go to [the end of this last column](#)

本期责任编辑：[华新民（美国）<cnd-cm@cnd.org>](#)  
本期 校对：[赵桦（美国）<cnd-cm@cnd.org>](#)  
读者技术咨询：[徐名扬（澳大利亚）<cnd-help@cnd.org>](#)  
网络技术维护：[熊波（美国）](#)  
[关蔚和（美国）<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主编：[萧同（美国）<cnd-cord@cnd.org>](#)  
《CND》总编：[温冰（加拿大）<cnd-manager@cnd.org>](#)

订阅（或停订）《华夏文摘》请寄：LISTSERV@UGA.UGA.EDU（GB版）

并请注明：SUB（或 SIGNOFF）CCMAN-L FIRST LASTname

或寄：LISTSERV@BROWNV.M.BROWN.EDU（HZ版）

并请注明：SUB（或 SIGNOFF）CNDBRU-L FIRST LASTname

停订命令不必加 FIRST LASTname

---

其他获取或阅读《华夏文摘》的途径:

无记名文件存取 ( F T P ) : ftp.cnd.org[132.249.229.100]: pub/hxwz

(加拿大读者可用: canada.cnd.org[142.132.12.100]: pub/cnd/hxwz)

考访服务站 ( G o p h e r ) : cnd.org (中文或英文目录)

万维网服务站 ( W W W ) : http: //www.cnd.org/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 0 2 1 - 8 6 0 2

---

本期编辑用软件: XLBR 2 . 0 ©严永欣 NJSTAR ©倪鸿波

GBLIST ©陈公权

本刊同时采用 ZWDOS ©魏亚桂 中文软件处理日常编务

---

HTML version rendered by XT